



上市银行ESG报告,离“第二张财报”还有多远

2026年是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披露制度落地后的首个集中披露期,42家A股上市银行均已披露2025年度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或可持续发展相关报告。从中可以发现,上市银行ESG披露重心正在由公益活动、绿色办公、员工关怀等责任展示,转向绿色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公司治理等主业议题。

这一变化意味着,ESG报告正在成为观察上市银行经营质量的新窗口。不过,站在投资者角度看,当前上市银行ESG报告距离真正成为可用于判断资产质量、风险收益和长期价值的“第二张财报”仍有差距。所谓“第二张财报”,并不是要求ESG报告复制财务报表,而是希望其补足传统财务报表难以充分呈现的中长期信息。ESG报告的真正价值,在于把这些非财务信息转化为投资者可用于判断风险、收益和估值的决策信息。当前,越来越多的全球资产管理机构已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框架。

从责任叙事到经营透视

2026年是A股ESG报告强制披露“首考年”。此前,沪深交易所相关指引明确,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在2026年4月30日前发布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

在制度推动下,今年上市银行ESG报告披露框架更规范、主业特征更鲜明。

从形式看,越来越多的上市银行不再将ESG报告作为公益案例汇编,而是更强调报告边界、编制依据、数据来源、指标索引和第三方鉴证。披露逻辑也在变化。比如,杭州银行明确数据披露范围与财务报告合并报表范围一致;南京银行设置“改进措施和实施计划”章节,开始呈现持续改进导向。

“今年上市银行ESG报告变化的驱动力,既来自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更统一,也来自监管约束和产业融资需求变化。”惠誉常青研究、评级及意见联席董事岳茜表示。

更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引入“双重重要性”分析,既看ESG议题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也看其对银行自身财务表现的影响。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厦门银行等披露了双重重要性评估情况。这表明,ESG议题正从外部责任转变为关乎经营质量、风险管理和财务影响的核心议题。

从内容看,上市银行ESG报告明显向主责主业靠拢。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公司治理等,成为多数报告的核心章节。报告叙事也从“做了哪些好事”,转向“如何配置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管理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是最典型的观察窗口。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的绿色贷款规模处于较高水平;苏州银行、厦门银行、常熟银行、沪农商行等也披露了绿色贷款余额、增速及信贷管理安排。这些样本说明,绿色金融披露已从单一余额指标拓展到更多维度。

更进一步看,部分银行开始把绿色金融与系统建设、风险识别、绩效考核相结合。例如,齐鲁银行将ESG风险管控嵌入尽调、审查、审批、贷后管理等环节;沪农商行在高管考核和分支机构绩效考评中设置绿色金融指标。

2025年以来,兴业银行将ESG管理全面融入公司战略、重大决策、日常经营和员工行为,持续提升内部治理能力。这显示,ESG并非停留在报告文本中,而是开始进入银行内部管理链条。只有当ESG要求从报告披露延伸至战略制定、授信管理、风险控制和绩效考核,相关信息才可能真正反映银行经营质量。

整体而言,上市银行ESG报告披露内容从责任活动延伸到资产配置、风险管理和内部治理。这类信息把ESG报告从“责任叙事”推向“风险叙事”,也为进一步观察其价值含量打开了入口。

从披露扩围到价值揭示

不过,记者翻阅上述报告后发现,当前ESG报告

仍存在共性问题:信息量越来越大,但真正可用于风险定价、估值判断和横向比较的信息仍然有限。

第一,绿色金融披露仍偏重规模、质量、风险和收益信息不足。各类银行普遍披露绿色贷款余额、绿色债券承销规模、环境效益等指标,但市场更关心的是:绿色贷款投向哪些行业?不良率如何?收益率是否具备竞争力?这些内容目前普遍披露不足。

“当前绝大多数银行尚未披露绿色贷款不良率、收益率等投资价值指标,导致投资者难以判断绿色贷款的真实风险与回报。”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

从现有样本看,少数银行已开始披露质量指标。例如,兴业银行披露的绿色贷款不良率低于企业金融贷款平均水平;邮储银行除披露绿色贷款余额外,还披露绿色债券承销、投资、发行等指标。这类信息比单纯的余额、增速更有价值,因为它进一步回答了“绿色金融是否创造价值”。

但从行业整体看,类似披露仍不普遍。多数报告仍以余额、增速、案例和环境效益为主,较少披露不良率、收益率、资本占用、风险权重。规模增长不必然等同于价值创造。缺少质量、风险和收益信息,市场难以判断绿色金融是增强了银行的长期竞争力,还是仅扩大了资产规模。

第二,投融资碳排放核算有所突破,但跨行可比性仍不足。多家银行已探索披露投融资碳排放核算,内容各有侧重,但数据覆盖范围、排放源口径、测算方法、数据颗粒度仍存在差异。缺少统一口径和可验证基础,碳排放信息就难以像不良率、拨备覆盖率那样进行横向比较。

一位股份制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对于支持企业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项目贷款,在银行实际操作中,受基准情景设定、数据采集和测算方法等因素影响,减排效果往往难以精确计量。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邓洁琳表示,投融资碳排放核算仍处于起步阶段,数据颗粒度较低,核算方法尚不统一,跨行可比性不足。

第三,ESG信息与财务结果的连接仍偏弱。绿色贷款增长如何影响净息差和信用成本?气候压力

测试是否改变授信政策和风险定价?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等工作能否降低投诉、处罚和声誉风险?公司治理和ESG考核是否真正影响授信、风控和资源配置?多数报告对此少有回答。

此外,风险披露仍显不足。一份有价值的ESG报告不应只呈现成绩,也应适度揭示风险与短板。邓洁琳认为,当前部分报告仍以成绩输出为主,对负面信息、风险敞口和整改机制披露偏少。

第三方鉴证范围也存在差异。部分银行已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关键数据执行有限保证鉴证,但鉴证仍多集中在用电量、公益捐赠金额等指标。相比“有没有鉴证”,市场更关心关键数据口径、风险模型等能否经得起验证。

实际上,证监会今年2月底明确表示,交易所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指引鼓励上市公司引入第三方鉴证或审验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对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经验和资质,以及第三方鉴证或审验报告的范围、依据、主要程序等信息披露进行规范。

由此来看,上市银行ESG报告距离“第二张财报”的差距,主要不在篇幅,而在信息的可用性。

从信息可读到定价可用

上市银行ESG报告要真正成为“第二张财报”,下一阶段的重点不是继续增加篇幅,而是提高信息质量,让披露内容从“可阅读”走向“可定价”。

首先,绿色金融披露应进一步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董希淼认为,绿色贷款不良率、收益率、行业分布、期限结构、风险权重和资本占用等,是更具投资价值的关键指标。考虑到各行披露基础不同,相关披露可优先规范不良率、收益率等核心指标,再逐步拓展至更细化指标。

但质量指标要实现真正披露,离不开数据基础和统一口径。董希淼建议,监管部门应加快信息数据平台建设,打破“信息孤岛”,推动数据共享;银行也应建立覆盖全条线的ESG数据采集系统,将ESG风险嵌入信贷审批和风险定价。

其次,应提升投融资碳排放核算、气候风险和转型风险信息的可比性。受访人士普遍认为,气候风险并非独立于经营之外,而是可能通过行业授信、客户信用、抵押品价值、资本消耗等渠道影响资产质量。只有碳排放口径更统一、覆盖范围更清晰、数据基础更扎实,相关信息才能真正进入风险管理和估值体系。

邓洁琳亦表示,要实现“第二张财报”的定位,银行需将ESG信息披露与财务报表同等对待,从治理架构上确保ESG从管理到行动的落地,并提升统计口径的可比性。国际先进银行的ESG报告不仅披露数据,还会分析气候风险对贷款减值、资本充足率等财务指标的潜在影响,而我国部分相关成果尚未有效转化为财务信息披露。

再次,要让ESG管理真正嵌入经营链条。ESG不是报告部门的单项工作,而应进入授信准入、客户评级、风险定价、贷后管理、绩效考核和公司治理。只有当ESG信息能够影响信贷政策、管理层行为时,披露才能从文本走向经营。

从国际经验看,提升ESG报告可用性还需更清晰的披露机制。岳茜表示,欧洲银行已在第三支柱报告中披露贷款组合与欧盟分类目录的对齐比例;在欧盟《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下,主体一旦制定转型计划就必须披露,未制定则需说明是否计划及何时制定。这种机制提升了信息的完整度和可预测性。

第三方机构和投资者也应发挥更大作用。受访人士普遍表示,第三方机构应加快完善ESG数据、评级和鉴证服务体系,为市场提供独立可信的信息验证;投资者也应更主动运用ESG信息进行决策,从而倒逼ESG披露质量提升。

总体来看,上市银行ESG报告已迈出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但其价值不应止于展示责任形象,而应进入风险识别、资产配置和长期价值判断。只有当ESG数据能够清晰勾勒出银行真实的资产底色、风险敞口、转型韧性 with 治理内核时,这份报告才真正配得上“第二张财报”的投资者期许。

苏向泉 熊悦

隐蔽入股三年终现形,两名证券从业人员领190万元罚单

近日,一条隐蔽操作三年的“入股暗道”被监管连根拔起。

江西证监局5月20日一次性挂出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证券从业人员苏华峰、史哲元违规持有拟上市公司股份的隐蔽操作曝光。两人利用“委托持股”的幌子企图规避监管红线,最终合计吞下190万元的高额罚单。

业内人士表示,这并非普通的违规炒股,在全流程监管和穿透式问责的背景下,这张罚单直接指向投行圈利益输送的灰色地带,体现了监管对证券从业人员违规持股零容忍的态度。

据江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年1月,苏华峰与一名名义持有人达成暗中协议。根据安排,名义持有人通过委托持股方式向苏华峰转让某拟上市公司部分股份。当月,苏华峰股权款转账至名义持有人指定银行账户。

几乎在同一时间,史哲元也如法炮制,与名

义持有人达成一致,名义持有人通过委托持股方式向史哲元转让某拟上市公司部分股份。次月,史哲元股权款转账至名义持有人指定银行账户。直到2025年9月,两名名义持有人将股权款等额退还给了苏华峰和史哲元,这场历时三年多的隐蔽入股游戏才算终止。

据了解,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江西证监局在调查过程中,调取了二人的任职信息、委托投资协议、询问笔录、银行流水及情况说明等关键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江西证监局认定,苏华峰、史哲元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所述违法行为。基于此,江西证监局决定对苏华峰处以90万元罚款,对史哲元处以100万元罚款,合计罚金高达190万元。

此事件并非一个孤例。记者梳理发现,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接连发生多起具有代表性的证券从业人员的处罚案例。

江苏证监局去年12月披露,对曾担任某证券公司副总裁的陈某涛非法买卖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4515.05万元,并处19030.1万元罚款,同时采取8年及5年两项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去年11月,厦门证监局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光大证券厦门展鸿路营业部从业人员刘泽方,在2020年1月至2024年11月期间,控制使用他人的证券账户委托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总成交金额逾3900万元。因违规买卖证券,刘泽方被厦门证监局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4.5万元罚款。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从业人员违规炒股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导致部分人抱有侥幸心理。

账上现金不足4000万元 上市前突击分红6730万元

“赌约”到期在即,溜溜梅第四次冲刺港股上市



在2019年冲刺A股未果,2025年两度递表港交所后,溜溜梅第四次向资本市场发起冲刺。5月21日,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前称“溜溜果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溜溜梅”)在港交所披露招股说明书,拟在主板挂牌上市,中信证券(香港)、国元融资(香港)为联席保荐人。

上半年的高增长并未延续至下半年

更名之后的溜溜梅,带来了更新的全年财务数据。招股书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收入分别为13.22亿元、16.16亿元和17.11亿元;年内利润分别为9923.1万元、1.48亿元和1.82亿元。以全年口径看,2025年溜溜梅收入同比增长5.9%,年内利润同比增长23.3%。

不过,拉长到下半年来看,溜溜梅的增长曲线并不平滑。此前招股书显示,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9.59亿元,同比增长约24.9%;期内利润1.06亿元,同比增长约75.4%。但随着2025年全年数据的披露,公司全年收入增速已明显回落至个位数。

据测算,2025年下半年,溜溜梅收入约为7.52亿元,而2024年下半年收入约为8.49亿元,同比下降约11.4%;2025年下半年年内利润约为7653.2万元,而2024年下半年约为8754.8万元,同比下降约12.6%。换言之,上半年的高增长并未延续至下半年,全年业绩被明显“拉平”。

分红比其账上现金还要多

在增长放缓之外,溜溜梅的资金安排也出现了一个颇具反差的细节,公司账上现金不足4000万元,却在上市前派出6730万元分红。

招股书显示,截至2025年末,溜溜梅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为3390.4万元,较2024年末的7804.7万元明显下降;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3522.4万元,仍不足4000万元。

而分红比其账上现金还要高。招股书显示,于住锁记录期间,溜溜梅及集团旗下其他实体概无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但在2026年5月10日,公司根据股东截至2026年3月31日于公司的股权向其宣派股息6730万元,并于2026年5月12日悉数派付。

事实上,除账上现金下降外,溜溜梅2025年的经营现金流也未能跟上利润增长。溜溜梅2025年经营活动所得现金流量净额为7447.5万元,而同期年内利润为1.82亿元,经营现金流净额仅约为年内利润的41%。

对于溜溜梅上市前的分红安排,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拟上市企业在上市前分红并不罕见,但溜溜梅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分红发生在现金储备下降、借款规模上升、经营现金流未能覆盖利润的背景下。这种情况下,分红更容易被市场视为上市前对原有股东、早期资本及核心利益方的一次利益安排。

越来越依赖少数头部客户

当量贩零食店开到街头巷尾,休闲食品品牌的货架也在重新洗牌,溜溜梅选择押宝零食店。

招股书显示,2023年至2025年,溜溜梅来自经销渠道的收入分别为8.82亿元、6.59亿元和5.31亿元,占比分别为66.7%、40.8%和31.0%。传统经销渠道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零食专卖店和会员制商店等新兴零售渠道。2025年,溜溜梅来自零食专卖店的收入为6.48亿元,占总收入的38.0%,已成为公司第一大渠道;超市及会员制商店收入为4.03亿元,占比23.5%,其中会员制商店收入占总收入8.6%。

这也让溜溜梅越来越依赖少数头部客户。招股书显示,2023年至2025年,溜溜梅来自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14.2%、33.1%和45.8%;最大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3.4%、14.1%

和16.4%。2024年及2025年,公司的最大客户均为全国连锁零食专卖店客户。

除此以外,应收款项也被同步抬高。招股书显示,2023年末至2025年末,溜溜梅贸易应收款项及应收票据分别为8052.6万元、1.63亿元和2.21亿元。公司解释称,2025年应收增加主要由于向公司提供信贷条款的会员制商店及零食专卖店销售额增加。

江瀚指出,相较于经销商渠道,大型零售客户通常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品牌商可能需要接受一定账期,部分销售从过去更快回款的经销模式,转为先供货、后结算的模式。换言之,渠道放量带来了收入增量,但货款并不会完全同步回到公司账上,应收款项规模也因此水涨船高。

溜溜梅的产品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招股书显示,溜溜梅主要产品包括梅干零食、西梅产品和梅冻。2023年至2025年,梅干零食收入分别为8.38亿元、9.74亿元和8.30亿元,占总收入比重分别为63.4%、60.3%和48.5%。2025年,梅干零食收入同比下降14.8%,收入占比首次降至五成以下。

与之相对,西梅产品和梅冻成为公司增长的重要支撑。2025年,溜溜梅西梅产品收入为3.80亿元,同比增长70.1%;总收入比重由2024年的13.8%升至22.2%;梅冻收入为4.66亿元,同比增长13.5%,占比升至27.3%。从收入结构看,传统梅干零食仍是第一大品类,但增长重心已经向西梅和梅冻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增长品类的毛利率并非全部向上。招股书显示,2025年,梅干零食毛利率为33.4%,较2024年的32.1%略有回升;西梅产品毛利率则由2024年的32.4%下降至25年的29.7%;梅冻毛利率由2024年的47.8%下降至2025年的45.4%。公司称,西梅产品毛利率下降主要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及西梅产品线产能提升;梅冻毛利率下降则与生产成本增加有关。

上市“赌约”绑定2026年6月30日

此外,在现金流、渠道和产品结构之外,溜



溜梅此次再闯港股背后,还悬着一个与上市时间绑定的“赌注”。招股书显示,公司曾于2015年至2025年进行四轮上市前投资,其中A轮投资者北京红杉曾享有股份回购权,公司已于2025年1月购回其持有的全部股份,2024年及2025年分别支付相关款项1.35亿元、1.26亿元;除红杉回购已结清外,部分投资者赎回安排仍与上市进度挂钩。根据2026年4月订立的补充协议,若公司未能于2026年6月30日前上市,深圳君荣、诺享瑞鸿及诺享东辰等投资者对应的股东层面赎回权将恢复。

从2019年撤回A股上市申请,到2025年两度递表港交所,再到更名后再次提交招股书,溜溜梅的IPO进程已走过多年。如今,摆在公司面前的,既有对赌节点的时间压力,也有下半年收入反降、现金下降、借款上升、客户集中度抬高等现实问题。靠一颗梅子讲出的资本故事,仍需要更多财务质量和持续增长来支撑。

兰京

上市银行“兼职董秘”将迎来调整

证监会4月24日发布《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自5月24日起正式施行。《规则》明确,要求董事会秘书不得兼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的董事会秘书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独立履职。促使上市公司董秘回归信息披露、投融资合规把控等主业,确保履职独立性。

自《规则》发布后,上市银行便开始了调整。长期以来,上市银行普遍采用“高管兼任董秘”模式,银行副行长、行长助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管兼任董秘是行业常态。

新规设置过渡期至2027年12月底,意味着上市银行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完成相关调整。不同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银行董秘的任职还需经过金融监管总局的任职核准。叠加专业人才供给缺口,上市银行或迎来一轮人事与架构的调整压力。

日前,华夏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董事会收到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杨伟的书面辞职报告。该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本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刘彦晋为华夏银行董事会秘书,其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尚需金融监管总局核准。

此前,上市银行“高管兼任董秘”模式较为常见。国有大行层面,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中国银行副行长刘承嗣、邮储银行副行长杜春野均兼任董秘,工商银行董秘由高级业务总监田枫林担任。六大国有银行里,仅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配备专职董秘。

股份制银行层面,也有不少银行有着上市公司高管兼任董秘的情况。例如,招商银行影家文担任该行副行长、董秘以及财务负责人职务,浦发银行副行长张健兼任董秘,光大银行张旭阳担任该行董秘、联席公司秘书、首席业务总监职务。

不仅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部分上市城商行、农商行亦存在着“兼职董秘”亟须调整的情况。例如,南京银行董秘由该行副行长江志纯兼任,渝农商行董秘由该行副行长谭彬兼任。作为上市公司“关键少数”,董秘是公司治理架构中的重要一环。新规明确要增强董秘的履职独立性,并对董秘的任职门槛有着明确要求。事实上,上市银行董秘岗位对任职人员专业化要求较高,不仅需要熟悉证券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也需要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等业务相当熟悉。

对于上市银行而言,董秘任职还需要通过金融监管总局任职资格核准。业内人士认为,从短期来看,上市银行将面临组织调整与“人才寻聘”的阶段性压力。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将推动上市银行公司治理规范化,助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金牛

无锡两大项目入选省级名单

近日,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省级质量认证服务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质量提升项目名单,全省共8个项目入选。宜兴市电线电缆产业质量提升项目、惠山区两机基础部件及材料质量提升项目上榜。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品种最丰富的线缆生产基地,宜兴坐拥131家电线电缆产业规上企业,规模逼近1800亿元。然而,受困于传统产品占比高、同质化情况严重等问题,企业“多而不优”,产业“大而不强”等痛点长期存在。为此,宜兴通过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开展专题培训、标准宣贯及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等方式,带动20家企业开展高端品质认证,向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升级。前不久的中国线缆行业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宜兴13家企业入围“中国线缆行业品牌百强”。

今年4月,无锡赛卢航空两机零部件特种工艺加工制造基地签约落户惠山高新区,为两机热端部件提供从加工到试验的全链条服务。打造无锡航空航天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江苏省(无锡)飞机配套产业链质量创新联合体、打造“政产学研研”协同质量提升模式……近年来,惠山区聚焦“两机”产业基础部件及材料国产化需求开展质量攻关,吸引越来越多项目投资于此。

用实践诠释“链主牵引、认证赋能、全链提质”的产业跃升样板,为特色产业打造出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自2022年以来,无锡累计获批国家级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试点1个、省级试点2个,获评省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质量提升项目2个。

周琦文 朱嘉瑶